



学员作品

悠远的「嘀嗒、嘀嗒」声

□ 李宜航

在前不久的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校校长陈希谈到了开国大将黄克诚的一篇文章——《关于党风问题》。

1981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刊发了黄克诚的《关于党风问题》一文。文中有无声惊雷：抗战时期，毛主席就是用个电台，嘀嗒、嘀嗒地指挥我们。“嘀嗒、嘀嗒”就要无条件地执行。没有什么人来监督，也没有人来批评、斗争，大家都自觉地执行延安的“嘀嗒、嘀嗒”。

为什么仅凭“嘀嗒、嘀嗒”，就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让全党全军行动如一人？

“嘀嗒、嘀嗒”，沿着这悠远而清脆的声响，我走进了一条时光隧道，想去找一找、看一看这背后的力量……

“嘀嗒、嘀嗒”，我找到了一块石头。这是一块再寻常不过的石头：三米长，两米宽，一米多高，也不知是什么时候被雷击破从山顶滚落，静静地卧在湘赣交界的荆竹山深处，当地人都叫它“雷打石”。1927年10月24日，正是秋高气爽，毛泽东就站在这“雷打石”上，向部队——一支仅剩100人左右的队伍，宣布了三条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这个“三大纪律”的最早雏形，就这样深深刻进了红军战士的生命里，化为钢筋，铸成铁骨，五岳也为轻！

“嘀嗒、嘀嗒”，我看见了一条街道。这是旧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外国冒险家的乐园。1949年5月的一个早晨，年轻的荣毅仁像往常一样，推开大门，他惊呆了：门前的大街上，躺满了解放军战士，军衣布满尘土，脸色很困很累，又都睡得很热很香……他开车到南京路上再去细看，见到的仍然是一排排席地而卧的解放军战士。此时的他，还不知道总前委制定的《入城守则》中有最重要的一条：不入民宅。但面对“露宿街头”这一中外军事史上都极为罕见的一幕，他不禁慨叹：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

“嘀嗒、嘀嗒”，我驻足于一面旗帜。那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第60军在长春投诚易帜，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的番号。就是这支部队，一年后扛着红旗随第四野战军南下，于1949年10月参加鄂西战役，打败了国民党军第79军。还是这支部队，在1949年的12月，又随第二野战军进攻四川，在成都战役俘获了国民党军官兵8000多人。为什么会这样“判若两人”？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改编后的部队中选派了2495名班长以上骨干到学校学习，战士们知道了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有了信仰。

“嘀嗒、嘀嗒”，我触摸到了一座“雕像”。这是一座还未落成的雕像，却在我心里矗立着。那是1950年10月，以南方兵为主的第九兵团奉命抗美援朝。时间太紧了，有的连队根本来不及

换装，士兵没有棉衣，就把几层单衣套起来，棉被也不够，就一个班共用两三条薄棉被。而那一年，恰巧是1888年以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零下40℃，滴水成冰啊！但就是这样一支队伍打了一场改变世界历史的长津湖之战，其中有一个连队只出来一个掉队的士兵和一个送通知的通信员，其余的全部冻死，临死的时候还保持着冲锋的队形……请问，全世界还有比这更壮美的“冰雕”吗？

“嘀嗒、嘀嗒”，这最简单又最有力量的音符，凝聚的是纪律，流淌的是信仰。只要“嘀嗒、嘀嗒”在，即便微如烛火，或邈若山河，都会一直有光、有梦、有春天。愿我们的耳边，都能经常响起这“嘀嗒、嘀嗒”声……

（作者系中央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研修班〈第1期〉学员、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管委会副主任）

汶川精神与家国情怀

随想录

□ 闫书华

汶川大地震过去快10年的时候，汶川县政府有个地震10周年的缅怀活动。一直对这个体现中国共产党制度优势、见证中国人凝聚力、书写人类抗震传奇的地方充满敬意，有个偶然的时机，我便毅然前往。到了当时汶川大地震的震中、汶川地震中伤亡最惨重的地方——映秀，我们顾不得舟车劳顿，来不及欣赏自然的神来之笔，便跟随县委领导来到漩口中学遗址。

四川的3月已没有凉意，迎着蒙蒙细雨，我们一行人踏入漩口中学遗址，所有人神情凝重，步履沉重，凝望着向前倾斜着的倒塌的教学楼，这座曾经承载了孩子们求知与欢乐的容身之所无情地趴下身子掩埋了孩子们弱小的躯体。见面未来得及问候正在轻声交谈的同志也顿时停了下来，所有人站在教学楼遗址前巍然斜立的石钟前泣不成声，石钟上的时间永远定格在当时地震发生的那一刻，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

巴蜀大地见证“中国力量”和“汶川精神”

地震之前，鲜有人了解这个风景秀美的小镇，这里自然条件十分优越，渔子溪河和岷江穿境而过，不仅山水秀美，生物具有多样性，而且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民族文化异彩纷呈，是个独具魅力的地方！

一场未曾预料的灾难打破了这里的平静。2008年在这里爆发的里氏震级8.0级、烈度达Ⅱ度的汶川大地震几乎把这里夷为平地。时任常务副县长的张通荣一辈子也不会忘记，5月12日那天，从艳阳高照瞬间到伸手不见五指，天摇地晃，遮天蔽日的扬尘滚滚而来，从未如此真实地面对死亡，到处都是哀号着冲向废墟寻找亲人的人们。2秒钟地震停止后，天地陷入一片混沌，头顶被浓尘笼罩着，能见度不足1米，一切通信中断。张通荣因为要跟上级汇报情况，情急之下想到了县里两部紧急卫星电

话，但也因为浮沉太厚无法使用。这座刚刚被重创的小镇犹如一座孤岛，无助和绝望在那一刻笼罩了这位基层领导干部的内心……长时间生活工作在基层，对于家国的概念，张通荣毫不避讳，以前，国家就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就像星空一样，永远存在，但遥不可及，这场灾难让他近距离感知了国家对于一个人的意义：“国家是什么？国家就是母亲，就是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会抛弃你的人。在万分沮丧绝望、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是祖国给了汶川第二次生命，没有祖国母亲温暖的怀抱，就没有汶川的第二次站立。”

震后37天，国务院制定《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震后4个月，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正式发布，提出了“三年基本恢复，五年发展振兴，十年全面小康”的灾后恢复重建总体目标。“一省帮一重灾县，举全国之力，加快恢复重建”。自此，中国开始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灾后援建行动。震后一年内，355万户震损住房修复加固全面完成；震后一年半，150万户农房重建全部完成；震后两年，25万户城市居民住房基本完成。地震灾区正在发生脱胎换骨的巨大变化，新的希望正从悲壮中豪迈地生长。

历经10年重建，如今的汶川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楼拔地而起，重建后的羌寨、碉房和邓羌坚固威严地在雪山下耸立着，仿佛向世人展现着汶川人的坚强与奋进。巴蜀大地见证了应对巨大灾难的“中国力量”和“汶川精神”，正孕育着感恩奋进的前行梦想。

一位普通党员搭建映秀十年党支部堡垒

中国共产党是由8900多万名党员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邹凌和天津泰达是我们映秀听老百姓提及最多的高频词，他和他的企业已经成为一个党组织在映秀扶弱帮困的符号。

2008年5月14日，得知汶川地震的消息，邹凌第一时间组建了由企业党员骨干组成的小分队，带着救灾物资，冒着余震频发、巨石滚落的风险，日夜兼程赶往震中。参与救援之外，邹凌一直在思考，家园摧毁、痛



失亲人的灾区人民除了物质上的满足外，用什么样的力量才能把灾区群众的心凝聚起来，激发他们勇敢地面对生活？少时贫困，有过军旅磨砺和机关工作锻炼的邹凌想到了党组织，他深谙党组织的特殊优势，于是他积极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受灾最严重的地方迅速挂起了党旗，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并向村民们作出承诺：“党支部在，战斗堡垒在，党员就是你们的主心骨。”

一句承诺，一个使命，一经开始就坚持到底。谈起10年来邹凌和他的团队对映秀的付出，老百姓们就热泪盈眶。无论是当时在抗震救灾第一线不眠不休以命相搏连续奋战22天，还是日后转战绵竹汉旺、什邡红白镇、北川曲山镇和擂鼓镇等6个重灾镇，为灾区人民送去面对面的帮助、自费捐助灾区学子读大学、捐出200万启动资金帮助渔子溪村办矿泉水厂、为身患重病放弃治疗的村民往返奔波求医问药，抑或连续10年坚持为映秀群众办年货、慰问困难群众、为孩子们准备红包，他都用实际行动进行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展示了新时代共产党员的风采。

如果说“汶川精神”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发展至今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的产物，那么对口援建和以邹凌为代表的普通党员对映秀的无私援助所折射的，则是一个在特定时刻、特定地点，因为一场特殊的灾难而守望相助，在同胞遇到困难需要施以援

手，在国家危难时一种自然的舍我其谁的家国情怀。

“汶川是我十分牵挂的地方”

2018年2月13日，农历的腊月二十八，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汶川县映秀镇考察，多次深情地说：“汶川是我十分牵挂的地方”。到漩口中学遗址，习近平总书记向汶川特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款的英雄敬献花篮并三鞠躬。他再三叮嘱一定要把地震遗址保护好，使其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不到映秀，你无法想象，映秀镇的家家家户户都自发地在房顶上挂着一面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善良淳朴的映秀人把国旗当作对国家感恩之心的寄托。这是一片洒满爱和充满感恩的土地，从依靠帮扶到物质富足，再到精神生活的追求和主动承担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在加快发展的氛围中，映秀人始终没有忘记祖国母亲的关爱和呵护。

汶川大地震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检验、折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展示了强大的“国家力量”。灾后的修复重建工作见证了我们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和非凡的执政能力，彰显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汶川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多难兴邦，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总会由进步来补偿。

须臾感动

□ 胡淼森

1000年前，才华横溢的李白写下了《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这首诗点出了悲切缠绵的思妇之苦，传诵一时。

400年前，王夫之遭遇丧母之痛，痛定思痛，痛何如哉。夜静，一轮明月如清泉泻下，洗涤了院落内的斑驳松影，王夫之彷徨之际，忽听有人长吟《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推扉伫望，却是同样无眠的兄长。丧妣之痛，瞬间化为凄凉落寞之感，哀莫大于心死，月色、吴歌、死生、宇宙……对于宇宙而言，人世间的种种悲欢离合只是沧海一粟，渺小得无以复加。但对于王夫之兄弟而言，母亲却是整个宇宙。“哀吾生之须臾，觉宇宙之无穷”，人生代代，未有时尽，这最难舍弃的恰恰是如云如影、如花如月的须臾啊。

许多从前读过的句子，在当时或许是索然寡味。久而久之，在记忆深处已经布满了尘埃，直到人生的某个瞬间，眼前的一丛枯草、一束青藤、一片颜色、一缕味道突然勾起了昔日的回忆。于是，模糊的突然清晰，我开始明白，那些我曾以为与自己无关的，恰恰构成了属于我又拥抱着的整个世界，灰尘被抹去，浮现的却是金属的光泽。这金属不是小杜在赤壁岸边弯腰拾起的前朝铁戟，它唤起的不是周郎曹公、东风铜雀的江山代谢之

叹。在别人，那是瞬间的风景，人生无数次相遇的一种，在自己，那是永恒，是唯一随时可以收进手心的风等。

文学在历史的河流中，是调皮的精灵，开着种种不合逻辑的玩笑，也拨弄着人类脆弱敏感的神经。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它勾起的反应简直无法用逻辑解释。鲁镇的社戏早已湮没，鲁迅久久不忘的却是那晚的茴香豆；小马德莱娜点心硬得非泡茶水才能咬动，却让普鲁斯特的心灵瞬间飞回了童年的贡布雷，飞回到等待母亲吻别的无数不眠之夜，飞回到斯旺和奥黛特家中寓意独特的茉莉花瓣，盖尔芒特家族的兴衰，初恋阿尔贝特的愁苦眼神。像《追忆似水年华》这样的经典小说，其结构严密如大理石砌成的圣殿，却是借助一块不经意的小点心完成了宏大叙事。这瞬间的文学灵感，无论对于写作者、思想者还是阅读者，都是一帘幽梦，了无痕迹，但当你以为自己忘却的时候，它开始悄然潜入心扉，在距离语言最远的角落酿造着无尽的意味。

这是文学的幸运，也是人的幸运。唯有情感、艺术是无法估量和计算的。你无法预见，在未来的某个时空，自己会为了一句诗、一首歌词、一幅连环画甚至一丛春花烂漫或一簇秋叶飘零怦然心动，梦中的城堡或许早已经被现实的风暴摧毁，仅存的只



影片羽却总能找到堆成玩具的海滩。行行重行行，渐行渐远的一份心情，总伴随一次不经意的感动“像一只飞鸟，日夜兼程地飞回到你的身边”。

李义山（李商隐）的诗句，因为其晦涩难懂而闪烁着扑朔迷离的光芒，无尽的心绪，也生成无尽的笺证注疏。叶嘉莹教授曾经谈到，少时读

《嫦娥》，颇不以为然，意为讽刺喻而已，直到以两鬓斑白之身返回魂萦梦绕的大陆故土上，当飞机穿梭于白云蓝天之际，《嫦娥》却如电光火石般打开了记忆闸门。“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无悔的青春岂能无悔，正如不说愁的少年又何尝无愁？人突然意识到了自己与根的疏远，更看到

了暮年将至，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千头万绪怎能不下了眉头，重上心头。我少时读此诗，亦以为李义山对嫦娥颇有嘲讽之意，所得甚浅，今日重读，方悟到那份只有诗人才能传递的，灭绝古今的孤独感。岂止此诗而已，诸如“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等诗句，亦是李义山杜鵑啼血的忧愁忧患，并非直陈其事。

做实理解文学的人，也不尽然要求文学符合事实，像明代为批驳汤显祖，专门考证男女主角是否真有其人的毕竟是少数；多数人往往将文学理解作为一种比喻或象征，例如高尔基的《海燕》必然象征革命先驱对暴风雨的渴望，李义山的《嫦娥》必然喻指失意的诗人，陶渊明诗中的孤云独鸟，必然是诗人人格的写照；我们恰恰忽视了，诗歌真正的本质在于感物起兴，山川、情感无不感时而动，“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黍离之悲，来自杨柳雨雪对诗人心灵的震慑力，我被眼前的情景感动，恰恰因为我不是他们，所以我能感受他们隐舍的生命意志。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并非人生如江水明月，那是曹公“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写法。诗人和读者一样：我来了，我看到，所以我——被征服。